

# 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翻译观

□覃江华 卢志君 [华中农业大学 武汉 430070]

**[摘要]** 瑞典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不仅译作等身,而且翻译思想丰富,涵括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三个方面。他将译者分为三种不同类型,并探讨了他们各自的翻译动机。在马氏看来,翻译也是一种学术;语际翻译不可能而又可能;译者要选择文学性高的作品翻译,他们在翻译过程中扮演多重角色;翻译需要重视有意味的形式、读者的需求与期待视阈;翻译是主体间的对话;翻译一个文本就是翻译一种文化。马悦然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思想给当前的汉语言文学翻译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考和启示,值得学界关注。

**[关键词]** 马悦然; 翻译观; 汉学家; 文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11)06-0080-06

马悦然(Nils Göran David Malmqvist, 1924-)是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瑞典学院(负责“诺贝尔文学奖”评选)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前会长、斯德哥尔摩大学荣休汉学教授……他身上的头衔和光环实在太多,加上国人剪不断理还乱的“诺贝尔情节”(Nobel Complex)<sup>[1]</sup>,使得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位“多面手”十分精彩的另一面,即他对汉语文学翻译及其理论建构所作出的卓越贡献。马悦然译作等身,且多次演讲或撰文阐述自己的翻译观,但迄今为止国内学界还没有相关研究。鉴于此,本文将对马氏的翻译思想进行梳理,并探讨其对汉语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 一、马悦然的翻译成就

马悦然传奇一般的学术人生始于他跟翻译结下的不解之缘。1946年,刚上大学的他因为接触林语堂《生活的艺术》的英译本,对道教和禅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由于对《道德经》的英、法、德三个译本孰优孰劣存有疑问,他拜访了著名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并追随后者踏上汉学研究和文学翻译的征途。

马悦然通晓多门外语,并致力于汉-瑞、瑞-汉、汉-英、英-瑞等几个方向的翻译活动。毋庸置疑,

将中文作品译介到西方是他用功最勤、成就最大的领域。早在1948年,他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译作——陶渊明的《桃花源记》。1965年以后,他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翻译了从上古、中古到近代、现代和当代的50余部中国文学、哲学和史学著作。他曾将《水浒传》、《西游记》译为瑞典文,并向西方译介了包括《诗经》、《楚辞》、《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史记》、《礼记》、《尚书》、《春秋繁露》等在内的古代典籍。汉朝民歌、南北朝诗、唐诗、宋词、元曲等等都是他翻译的对象。

马悦然虽然师承高本汉,“心向先秦”,但与后者不同的是,他通过翻译活动完成了北欧汉学研究的两大转向:一是从语言文字到文学文化的转向,走出了纯粹解决知识之谜的藩篱,拓展了汉学研究的范围;二是从古代经典到现当代作家作品的转向,开始了以“文化相互渗透”为特点的新型汉学研究。<sup>[2]</sup>他翻译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包括鲁迅、毛泽东的著作,沈从文的《边城》、《从文自传》,张贤亮的《绿化树》,李锐的《厚土》、《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还有老舍、孙犁和浩然等人的小说。由于他的努力,高行健的《灵山》还获得了2000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与其说是高行健的作品,不如说是马悦然的译作导致了此次获奖。”<sup>[3]</sup>此外,他还特别钟情于汉

**[收稿日期]** 2011-03-08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11RW035); 华中农业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项目(5220410069); 华中农业大学外语学科教学科研专项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WJK09-8)

**[作者简介]** 覃江华(1982-)男(土家族),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卢志君(1972-)女,硕士,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诗外译,曾翻译过闻一多、卞之琳、郭沫若、艾青、北岛、顾城、舒婷、芒克、江河、杨炼、严力、商禽和杨吉甫等人的诗歌。通过他的译介,一些瑞典诗人(如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等)的作品也逐渐为中国读者所了解。他对英美文学也十分关注,译介过诗人威廉·布莱克、T.S.艾略特和斯坦利·库涅茨等人的作品。

## 二、马悦然的翻译观

马悦然不仅语言学造诣登峰造极,翻译著作汗牛充栋,他对翻译活动的一些理论思考更是发人深省。

### (一) 译者分为三种类型

马悦然认为西方从事汉语文学翻译的译者有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类是以此谋生的职业翻译。这类译者数量并不多,整个欧美可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他们水平良莠不齐,一般不能自己选择所要翻译的作品。第二类是业余翻译家。他们多半掌握了必要的语言技能,对文学真正感兴趣,自己决定要翻译什么作品。对他们来说,翻译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出于爱好。第三类翻译家本身是作家或诗人。他们对待原文态度比较随便,时不时地在译作中展示自己旺盛的创造力。如卞之琳、余光中等人的自译,有时与原文出入很大<sup>[4]103-104</sup>。

马悦然将自己归入第二类译者。他说:“翻译刺激了知识交流,发挥了很大的作用。”<sup>[5]5</sup>“我从事翻译工作最重要的动机是让我瑞典的同胞们欣赏我自己欣赏的文学作品”<sup>[4]142</sup>,并把这看做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觉得,翻译工作像吸毒一样:一旦开始,就不容易停止。“一个汉学家除了专题研究外,还应当把他所学的知识贡献给人民大众,把他喜欢的、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翻译出来,从而使外国对中国文化与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更浓厚的兴趣。”<sup>[4]52</sup>

### (二) 翻译文学性高的作品

因为其在学术界(特别是汉学界)的权威地位以及他“业余翻译家”的身份,马悦然在文本选择方面享有多数译者所没有的自由。众所周知,他对川籍诗人与作家情有独钟,但总体来说他有自己严格的选译标准。他认为要翻译文学领域的“开辟者”,比如北岛、李锐等,因为他们都开创、扩大了当代中国文学的视野;或有独创精神、别出心裁的作家,如残雪,因为她不顾左右走自己的路,而且对卡夫卡有独到的研究;或名气不大、被遗忘的优秀作家和诗人,如曹乃谦、杨吉甫等。

事实上,贯穿他文本选择标准的有两个核心理念:1)要翻译文学性高的作品。在致艾青的一封信中,他讲得很清楚:“我选择翻译作品的原则是以文学价值为主。”<sup>[4]53</sup>对于有的中国学者批评外国翻译家翻译的东西就是中国政治、社会的黑暗面,他不赞成。他说,“我喜欢李锐,我喜欢曹乃谦,就是因为他们的东西文学价值非常高。我翻译他们的作品,不是因为他们反映中国落后的农村社会,而是作品价值高。”<sup>[6]6</sup>他译介名不见经传的万县诗人杨吉甫也是基于同样的理念。2)要翻译自己喜爱作家的全部作品。捷克著名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usek)曾说过“没有翻译过一部作品,你就没法评论它”,马悦然深以为然。他指出:“对一部文学著作,不管你阅读得如何仔细,但只有坐下来翻译的时候,才能真正开始把握它。”<sup>[7]4</sup>基于这个理念,马悦然翻译了北岛的全部诗作,并完成了高行健和李锐绝大部分著作的译介工作。

### (三) 翻译不可能而又可能

马悦然能取得旁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与他开阔的学术视阈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一名语言学家,马悦然不仅从语言学,更是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待语言符号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翻译问题。

马悦然认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他认为“语言限定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同样一个“黄”字,瑞典语中的“gul”、德语的“gelb”和英语的“yellow”的语义范围并不一致。“语言也许成了我们的唯一现实”<sup>[4]104</sup>,所以“即使是最熟练、最尽责的译者有时都不得不满足于翻译语符(label),而非其背后的社会现实。”<sup>[7]2</sup>他曾以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对上帝存在的本体性证明为例,来说明最有经验的译者有时也不得不望洋兴叹。

例[1] Deus bonus est, ego deus est.

译[1] 神善故神在。

这一证明完全基于拉丁语特殊的语言结构之上。“esse”(“est”的原形)既可以用作联系主语和表语的系动词(相当于英语中的“be”),意为“是”;亦可作为不及物动词来理解,意为“存在”。马悦然说,任何试图将这种本体性证明翻译到汉语或俄语中的做法,都将以失败告终。曾被认为是具有永恒价值的箴言,只不过是多数印欧语所共有的一个特点而已<sup>[7]2</sup>。同理,一种语言的固有范畴(obligatory category)可能在另一语言中并不存在,或者存在但是表达方式并不一样(如汉语缺乏时态和单复数的语法标记等),翻译起来就困难重重。

他认为：“西方从事中国文学（特别是古诗）翻译的译者常常为西方语言的腐朽、专横式的要求所掣肘，被迫明晰化原文没有的细节，从而不能传达其独特的普遍性和无时间性。”<sup>[7]16</sup>译者此时有两种选择：要么撒手不干，彻底放弃翻译；要么一路跌跌撞撞地继续前行，每一句都要犯下削足适履罪恶。

但反过来，他也认为虽然很多人都觉得文学（特别是诗歌）作品不可译，可是一些能力超群富有献身精神的译者没有被看似难以逾越的鸿沟和障碍所吓倒。在他们的努力下，很多不朽之作成功地跨越了文化边界。他指出，纯语言层面的困难大多可以被精通两种语言的译者成功化解。如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就很好证明了这一点，哪怕是双关语和文字游戏，都可以被成功移植到另一语言<sup>[7]12</sup>。问题是：要处理好绝对与相对的关系以及忠实与再创之间的张力，译者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呢？

#### （四）译者扮演多重角色

马悦然认为译者扮演着多重角色。首先，译者是奴隶。他说：如果作者和诗人被看作是“缔造者和创造者”（the Maker and Creator），那么译者就是理想中的技巧熟练的工匠或艺师（craftsman）。而且据我们所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古代的工匠都是奴隶，而奴隶的首要道德就是“克己”（self-denial）意识。在马悦然看来，翻译家就应该“像奴隶一样工作”。

其次，译者还是架桥人（bridge builder）。“一个文学作品要超过语言的界限只有依赖翻译家所架的桥梁。”<sup>[4]103</sup>“通过译者的辛勤劳动，他人就能分享译者的阅读体验。译者促进了对外国文学与文化的理解。如果没有这种理解，世界将变得更加贫瘠。”<sup>[8]21</sup>

最后，译者是演员（或模仿者）。译者必须“模仿（imitate）原作者，译文必须把原作模仿得惟妙惟肖。”<sup>[7]3</sup>马悦然认同斯坦纳（G. Steiner）的翻译观，把翻译看作是一件“克己”式的工作。他认为译者必须服务于原作，不得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虽然有时译文因为某些原因看似优于原作，但译者不得试图超越原作者。另一方面，与“读”和“听”一样，所有的翻译都是一种编辑和阐释，会受到翻译主体和客观因素的制约。虽然有时译作胜过原作，并得到读者认可（如林纾的翻译就受到胡适、阿瑟·威利和钱钟书的喜爱和肯定），但是译者必须模仿原作，他的译文必须近似于原文。否则，他就会“添加原作没有的色彩。”<sup>[7]3</sup>

马悦然说：“一个翻译家不能创作原文。不应该的，不应该的。现在的翻译家，有的非常好，有的差，有的糟糕极了。我看到翻译不好的作品，心里很难过。”<sup>[6]7</sup>他对译者与作者关系的高度关注与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不谋而合，如以“形式语用学”（或“普遍语用学”）和“交往行为”理论为进路，来探讨译者伦理以及译者在“话语中的非作者地位”<sup>[9]</sup>。依据马氏的翻译观，译者在有限自由的范围之内，必须恪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忠实于原作者，兼顾但不一味迁就译文读者。他主张：“一个翻译家应接受两方面的责任：一面要对得起原文作者，一面要对得起他的读者。不愿意接受这双重责任的译者应该取消资格。”<sup>[4]106</sup>

有人认为，生活在民主社会的马悦然居然抛出“译者是奴隶”的提法，这显然有悖时代潮流，跟理论界热议的翻译研究之“创造转向”（creative turn）以及译者的“操纵”、“显身”和“叛逆”也格格不入。但是，马氏此种提法并非哗众取宠或厚古薄今，而是有其现实针对性。有感于对中国文学作品肆意增删修改的“暴力”侵占行为，他将蛮横的西方译者“贬身为奴”，无疑是要提醒他们克服自己的种族中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和自恋情结，以一种平等、民主的方式来欣赏和翻译源语文化。这也让人想起卢梭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sup>[10]4</sup>

对马悦然来说，“翻译是一项因爱而起的工作。”<sup>[7]4</sup>但是，这种爱必须受到译者对原作者与译文读者的双重责任的限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处理的是两种文本，但是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译者的任务就是，“尽可能传达原文的意义，甚至包括原文的形式和结构所连载的意义。”<sup>[4]104</sup>

#### （五）重视有意义的语言形式

马悦然认为翻译有两种具体的操作模式。一种是译前通读几遍原文，以感受原文的语言结构和文思的流动，在心中默默记住可能引起麻烦的难点，并思考如何进行翻译。在通读全文的时候，经常在头脑中将原文默读出来，以感受原作者的声音和“在场”。当自己的声音与原作的呼吸和声音协调一致时，翻译工作也就完成得差不多了。另一种方式是边看边译，这样翻译的过程就充满了意外惊喜，就如走在一条曲曲折折的山路上，译者永远不知道转过下一道弯之后，展现在面前的将是怎样的一幅美景。

马悦然喜欢第一种方式，因为这样可以发现原文易被忽视的语言形式特征，如方言俚语、诗学形

式和偏离现象等等。在他看来,这些有意味的语言形式是有其特定功能的,译者在翻译时“必须设计一种适合原文的语言。”<sup>[4]100</sup>

1. 方言俚语的翻译。在西方汉学界方言研究领域,马悦然是除高本汉之外的又一巨擘,对汉语方言的翻译别有洞识。他强调说,“译者应该尽量准确地表现原文中的方言特色,这一点很重要”<sup>[4]101</sup>在翻译《水浒传》时,他发现众好汉中有两人是同乡(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都是关西人),也只有他们用“洒家”当第一人称。他判断,这种称谓可能是外来语,所以就用了吉卜赛语借词“mandrom”来翻译“洒家”,再现原作的形式功能特征。

马悦然认为:方言用表意的汉字书写,语音上的特征往往被掩藏,但是这些特征会在词汇和句法的层面显示出来。“这些突显出来的方言特征必须在译文中予以模仿。”<sup>[7]14</sup>如果译者未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他就犯下淡化原作文学性的致命罪行。郭沫若诗的译者如果不懂乐山方言,将很难圆满完成任务。中文的这种形式特点也使得译者在翻译“Ah ain't got no money”这种方言俚语时显得捉襟见肘。

2. 诗学形式的翻译。马悦然认为,“有时两种语言之间的形式差别太大,任何将诗学形式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的尝试注定要以失败告终。”<sup>[7]14</sup>如果一首诗的音步与其内容联系太紧密,要找到一个不对原文造成亏损的译文,几乎是不可能。

例[2] 这是|一沟|无望的|死水。

春风|吹不起|半点|涟漪。

“诗歌的建筑家”闻一多先生主张诗的形式必须悦人耳目。在其名诗《死水》中,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音韵美。该诗每行有九个音节,由三个双音单位和一个三音单位构成。三音单位在每行的位置并不一样,从不出现在行尾。通过这种形式上的安排,诗人“创造了规范结构中韵律的紧张。”<sup>[4]159</sup>如果将首行翻译成英文“Here's a ditch of hopeless deadwater”,原诗的节奏就遭到了破坏,一首优秀的现代诗也就遭到了无情的谋杀。在马悦然看来,译者必须充分把握原诗的语言特征。他对自己用瑞典文翻译的《闻一多诗选》非常满意,因为“格律与闻一多的完全一样”。

3. 偏离现象的翻译。马悦然认为,文学翻译之病主要集中于两点:“常规化”(normalization)和“平淡化”(leveling),即修剪原作、磨光削平其棱角、降低其文体效果的做法。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各有其特点。作者(作为原文的创造者)拥有处

理原文形式的自由,可以违背规范、生造新词、扭曲句法和把玩词语的多义性。但是译者(作为一名匠人)“必须竭尽全力去传达这种偏离现象。最糟糕的常规化和平淡化做法就是任意删减原作,然后添加原文没有的东西。”<sup>[7]15</sup>

#### (六) 翻译文本就是翻译文化

“文字从一种文化环境被转换到另一种文化环境中去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严重的误解。”<sup>[7]12</sup>作为一名翻译家,马悦然不仅仅是从语言上来看待双语之间的转换,更是从文化的高度高屋建瓴地看待翻译问题。

与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特(W. von Humboldt)的观点相似,马悦然认为“每一种源语都表达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与译入语的世界观迥然不同。”<sup>[7]15</sup>译者必须明白:“翻译一个文本也就是翻译一种文化。”<sup>[7]15</sup>如果这些文化因素对译入语读者来说显得陌生,那么译者就有责任将其阐明。他本人倾向于在前言或导语中集中处理这些文化因素,而不是使用脚注,因为注解会打乱文本的流畅性<sup>[11]</sup>。

马悦然指出,我们应避免犯“常规化”的错误,谴责“平淡化”源文化的做法<sup>[7]15</sup>。金恩(Evan King)在翻译老舍的《骆驼祥子》时,把小说的结局改编成了好莱坞式的喜剧,对此,他多次提出批评。对于巴金《家》、《春》、《秋》英译本,他觉得对话部分译得还不错,但很多叙事部分因为译者觉得烦琐竟被大量删除,这也是不可取的。如此看来,英美汉学界当代中国文学首席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大量删减《狼图腾》英译本中的引语(epigraph)和议论性话语的做法颇值得商榷。

马悦然认为,中国的好作家好作品多的是,但好的翻译太少了。如今的很多译者对文学或翻译作品并不感兴趣,把翻译书简单地当成一个“活儿”,自然容易偷工减料。他提醒说,译者必须谨记这一点:只有发挥“移情”(emphathy)作用才能避免误入歧途。感情移入(不一定移入到作者身上,而是作品之上)将带来“共同感受性(common sensivity)”<sup>[7]16</sup>,而这将有助于实现原作与译文在风格上的统一,也将有助于实现译文读者与译文乃至原作者之间的对话。

#### (七) 翻译是主体间的对话

如前所述,马悦然重视译者的伦理,而且将翻译看作是一种“阐释性”活动,这与哲学阐释学的翻译观有颇多契合之处。与伽达默尔(H-G. Gadamer)一样,马悦然将翻译看做是主体间的一种“对话”。

依据马丁·布伯(M. Buber)的区分,对话有

两种模式：“我-你”(I-Thou)模式和“我-它”(I-It)模式。前一种是“主体-主体”模式，对话双方是平等关系；后一种是“主体-客体”模式，对话双方是不平等关系。前一种的特征是：“相互性、开诚布公、直接、诚实、自发、不伪装、不操纵、共享、热情以及对他人负责意义上的爱。”后一种的特征是：为了一己私利而将他人当做“体验、征服与利用的对象”。<sup>[12]48-49</sup>

在马悦然心目中，通过阅读文学作品，“读者和作者之间就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sup>[4]100</sup>接受主体（读者）和创造主体（作者）之间的这种对话无疑是平等、交互、坦诚和共享的。他认为，“一个读者在欣赏一首诗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参与那首诗的创作过程。”<sup>[4]64</sup>同理，译文接受主体与译语文本主体、翻译主体及创造主体之间所进行的对话，也应该是平等、交互、坦诚和共享的，没有伪装，没有操纵。因此，他深化了对译者主体的要求：“译者的任务在于促进它的译文和读者之间建立同样的对话。”<sup>[4]100</sup>

马悦然虽认为译者要像“奴隶”一般工作，但这更多地是对强势文化话语霸权的一种拨乱反正，他真正向往的对话模式是前一种。作为一名汉学家和翻译家，马悦然既是学者，又是文化中介者。他特别重视与作者的对话与交流，北岛、顾城、李锐、高行健等人都是他的座上宾，川南和雁北留下过他的足迹。在翻译曹乃谦的作品时，他甚至每天与作者通信，请教一些难懂的山西方言。作为译者，他是两种文化的双向中介；作为学者，他力图在具体文化语境中解读文本。因此，通过翻译活动，“他把汉学研究从一种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关系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升华到一种主体间交往的关系，这样汉学研究便可以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中达到一种高层次的文化融合。”<sup>[13]69</sup>

马悦然十分看重翻译活动，他明确主张：“翻译工作也是一种学术。”<sup>[4]142</sup>而且，这种学术研究与审美有一定的关系。他将自己的翻译活动与汉学研究整合起来，“寻找那真理之美，满足自己的兴趣。”<sup>[4]178</sup>作为一名最重要的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在促进东西方对话，“在推动中国与瑞典（或者西方）的文化相互了解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怎么估价也不为过的。”<sup>[14]400</sup>

#### （八）重视读者的需求与期待视阈

马悦然虽然尊重原作者，但并不忽视译文读者。他十分重视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期待视阈，认为翻译要让读者知之、乐之、好之。在谈到孔子学院重译古代典籍（《五经》）时，马氏指出：“问题是重

新翻译的《五经》的读者到底是谁？除了学人以外，对《五经》译文感兴趣的外国读者可能非常有限。”他比较赞成台湾进行的“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工作，认为“对中国读者来说，台湾商务印书馆和三民书局所发表的古文今注今译的著作是非常值得赞美的事。”在他看来，典籍翻译极其重要，负责这种工作的学人“当然应该自己精通他们所翻译的著作。要不然，他们只能算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屠户了。”<sup>[15]</sup>马悦然的提醒可谓深中肯綮。首先，翻译发起人要对目标读者有所定位和研究；其次，要慎重选择译者。不称职的译者就好比是屠夫，不仅欺骗译文读者，而且冷血谋杀原作。

另外，除开上文论及的语际翻译与语内翻译，马悦然还曾谈到诗歌与绘画之间的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他认为，“一个读者在欣赏一首诗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参与那首诗的创作过程”<sup>[4]64</sup>。诗人有时会用画家的眼睛和画家的笔来创作。因此，读者需要把诗的每一句“译”成一幅画的片段。如此看来，读者是语内符际翻译者，而译者则是一位跨文化的符际翻译者。马氏虽然没有就此进行详细讨论，但他的观点对“读图时代”的符际翻译研究无疑具有一定启示。

### 三、结语

马悦然这位已届耄耋之年的西方汉学家、中国文学最权威的知音，毕其一生的精力研究和译介中国文学与文化，成绩斐然。他身体力行，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赛义德(E.W. Said)对西方的“东方学者”的偏见。马悦然的翻译观内涵丰富。他将译者分为三种类型并探讨了他们各自的翻译动机。马氏认为，语际翻译不可能而又可能，译者要选择文学性高的作品进行翻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扮演多重角色。他们需要重视有意味的形式、读者的需求与期待视阈。他把翻译看做是主体间的对话，认为翻译文本就是翻译文化。作为其翻译实践的总结和升华，马氏的这些翻译思想带给我们诸多启示与思考。

当然，马氏的另外一些提法也还值得商榷，如“一个中国人，无论他的英文多么好，都不应该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sup>[16]</sup>的提法，就是一种双重标准。英语并非马氏的母语，但他不仅从事瑞诗英译（由他翻译的特朗斯特罗默的诗比英语母语译者的译文更受出版商青睐<sup>[8]20</sup>），而且从事汉诗英译活动（如《译丛》就曾发表马氏所译杨吉甫之诗）。

解构主义大师保罗·德曼曾经说过，一个研究者如果不对本雅明《论译者的任务》说些什么，他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Dec.2011, Vol.13, No.6

将什么都不是<sup>[17]73</sup>。我们也许可以说: 如果不对马悦然的翻译观说点什么, 无疑是汉语文学翻译研究者的失职。

### 参考文献

- [1] LOVELL J.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Quest for a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 [2] 罗多弼. 汉学研究在瑞典[J]. 学术研究, 1997, (3): 47-49.
- [3] 刘军平. 翻译经典与文学翻译[J]. 中国翻译, 2002, (4): 38-41.
- [4] 马悦然. 另一种乡愁[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 [5] 马悦然. 瑞典与中国的知识交流[J]. 张振江, 译. 中山大学学报, 2008, (3): 1-5.
- [6] 马悦然, 欧阳江河. 我的心在先秦[J]. 读书, 2006, (7): 3-13.
- [7] Malmqvist, Göran. On the Role of the Translator[J]. Translation Review, 2005, (70): 2-6.
- [8] Malmqvist, Göran. On the Craft of Translation [J]. 中国翻译, 2006, (1): 19-21.
- [9] PYM A. The Translator as Non-author and I Am Sorry about That [EB/OL]. [2010-12-21]. [http://www.tinet.cat/~apym/on-line/translation/2010\\_translatore\\_as\\_author.pdf](http://www.tinet.cat/~apym/on-line/translation/2010_translatore_as_author.pdf)
- [10] 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11] Malmqvist, Göran. On the Art of Translation [J]. Translation Quarterly, 2000 (18 & 19): 1-17.
- [12] 单继刚. 翻译的哲学方面[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 [13] 萧俊明. 北欧的中国学追述(上) [J]. 国外社会科学, 2005 (5): 62-73.
- [14] 罗多弼. 面向新世纪的瑞典中国学研究[C]//张西平, 编. 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6.
- [15] 马悦然. 对重新翻译《五经》的一些看法[N]. 东方早报, 2010-02-07(上海书评).
- [16] 许黎娜.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称中国人千万别翻译本国作品[EB/OL]. [2006-07-21]. <http://news.hsw.cn/system/2006/07/21/004595173.shtml>
- [17] de Man, Paul.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 Swedish Sinologist Göran Malmqvist's Ideas on Translation

QIN Jiang-hua LU Zhi-jun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Nils Göran David Malmqvist, the established Sinologist and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Swedish Academy, is known not only for his large amounts of translation works, but also for his insightful ideas on translation, covering intralingual, interlingual and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He classifies the translator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to three groups, each with their respective purposes. He thinks that translation is also a kind of academic pursuit and that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is fundamentally impossible, yet possible to some extent. Malmqvist advocates that a translator, who plays different roles in the translating process, should choose the highly literary works to render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meaningful form of the text, the reader's taste and expectation. He perceives translation as a kind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different subjects and the rendition of a text as the translation of a culture. Hi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nd thoughts on them bring us new understandings about and revelations on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into other languages, which call for more studies from the academics in the field.

**Key words** Göran Malmqvist; ideas on translation; sinologist; literary translation

编辑 刘波